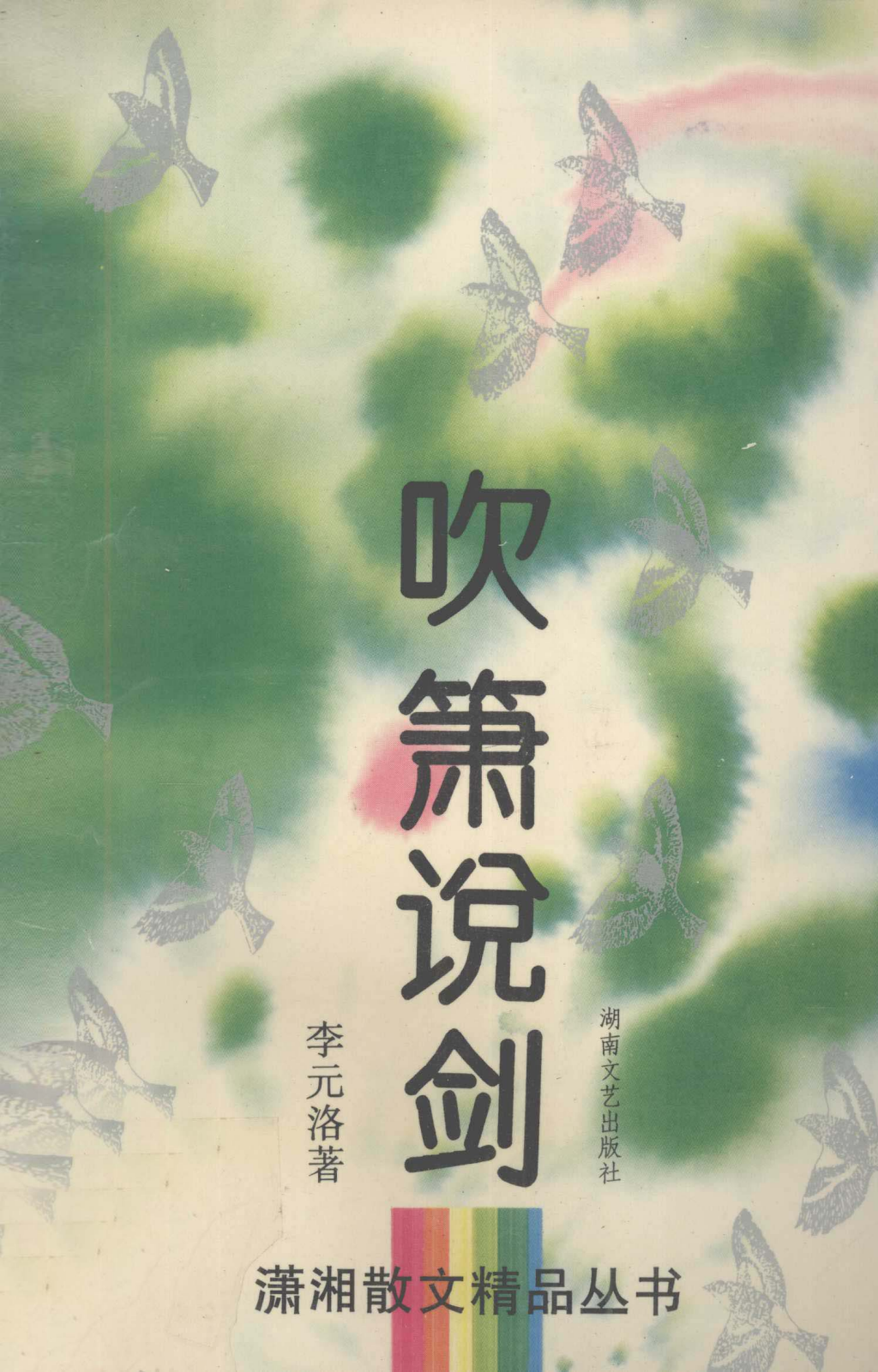




吹箫说剑

李元洛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潇湘散文精品丛书

精品丛书



吹箫说剑

李元洛 著

〔湘〕新登字 002 号

吹箫说剑

李元洛 著

责任编辑：余开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25 插页：1

字数：194,000 印数：1—8,000

平装：ISBN7-5404-1446-4
I·1152 定价：9.7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目 录

落笔湘云楚雨（代序）

..... 余光中

我的散文观..... 李元洛

第一辑

日月潭记.....（15）

澄清湖一瞥.....（20）

天涯观海.....（26）

云山长忆外双溪.....（36）

远有楼台只见灯.....（43）

还我青春火样红.....（49）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54）

海上生明月.....（61）

旺角书香.....（68）

香江夜眺.....	(73)
岛国诗夜.....	(77)
来自远方的好音.....	(83)

第二辑

古樟二重奏	(91)
春泛南洞庭	(96)
书院清池.....	(100)
黄桑碧海.....	(104)
雪峰灵泉.....	(111)
秋日登高.....	(116)

第三辑

回到童年.....	(125)
一去不还唯少年.....	(131)
少年游	(137)
回首话青春	(142)
书架·书角·书房	(148)
苦辣酸甜说读书.....	(154)
师恩	(161)
寸草之心.....	(166)

我的思念在彼岸	(173)
“方城之战”新说	(181)
“盗亦有道”的联想	(187)
信笔说“信”	(193)
托“线”之福	(200)
佚名之憾	(205)
岳麓书院品茗记	(212)

第四辑

隔江便是屈原祠	(219)
客舍并州	(224)
后赤壁行	(234)
春到桃花源	(240)
相见恨晚	(247)
怅望千秋一洒泪	(250)
夜读岳飞	(262)
崩霆琴	(265)
万里长城万里长	(274)
芷江行	(284)
凤凰游	(290)
南岳峰高	(297)

书院夜游.....	(304)
八月洞庭秋	(310)
附录：散文的诗意	(318)
后 记	(325)

落笔湘云楚雨

——代序

余光中

相传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并且为文。这对于散文家说来，起步似乎晚了。正如凡高认真习画，也是从二十七岁开始，对艺术家而言，同样去日苦多。湖南作家李元洛发愤创作散文之年，比起老泉当日，却又老了一倍，可以想见，其毅力与艰难，当也倍加。不仅如此，李元洛原是著名的评论家，年过五十才认真写起散文来，但是手上的那枝笔已经生产了十本诗评、诗论，洋洋且三百万言。评论家改行从事创作，心路历程是由分析转向综合，由客观转向介入，由估价转向赚钱，方向几乎完全相反。学者半途而写散文，像王了一、颜元叔的例子，似乎不多。不过王、颜的半途，都在四十上下，而李元洛半途出家，却已经过五十了：出家而要成家，评论出家而要散文成家，真是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李元洛出家后的第一站，这本《凤凰游》散文集，风景仍是可观的。我说风景可观，并不全是比喻，因为集内的三十四篇文章，游记多达十七，恰为其半。

中国游记之祖，柳宗元的经典之作《永州八记》，说来也巧，记的正是李元洛的湘乡。所以湘人

来写游记，真可谓得天独厚：此地的“天”，不但指柳宗元为之奠基的游记，在湖南早有“先天”，更指湖南山水之胜，自古已兼南岳之雄、洞庭之大、潇湘之浪漫、桃源之神奇，近年又变本加利，发现了张家界和黄桑碧海。

幸运的是，柳宗元写游记，是贬谪他乡之作，李元洛的游记却得之於探幽寻胜，多为盛会或陪客之余，而且所游多为本乡，十七篇中湘游占了十四。中国历来著名的诗文，不少是登临怀古之作。李元洛家学有自，所赋五言律绝《破庙》曾得乃父修改。他出身全国知名的北师大中文系，诗学邃深，古诗之博闻强记远胜於我。加以三湘人文鼎盛，名胜自多古迹，所以本书的游记，除了写张家界、黄桑等三两篇是纯记山水之外，多半涉及历史、人文，感慨之余，更常具知性，可以称为“文化之旅”，而怀古伤今之中每见作者指陈世风浇薄、环保不力，庸俗的商业主义逼人不留余地，则更进一步，可谓“文化苦旅”了。

游记而为文化之旅，一枝笔外在既要模山范水，内在又要探讨人文，其忙可想而知。最难的是，感性的风景，知性的人文宜乎顺应文势，左右逢源，不落痕迹地凑泊而行，不宜各自为政。如果知性不足，则风景写得再富感性也会显得空洞；反之，如果感性不足，则徒然堆砌资料也会显得失真。写这样的游记，叙事必须生动，写景必须逼真，然后议论才有所本抒情才有所依。不少作家在叙事、写景上未竟全功，就急於空发议论，滥抒感情，当然不能令

人如临现场。

《凤凰游》里的十几篇文化之旅，若以年代为序，当推《秋谿炎陵》的神农遗迹最为高古，《隔江便是屈原祠》次之，其后当为《春到桃花源》、《南岳峰高》、《龙标记游》、《赤壁行》、《麓山春日》、《半日青山》、《书院夜游》、《崩霆琴》、《芷江行》，以迨寻访沈从文故居的《凤凰游》。

其中《赤壁行》所记，是三国时代真正的战场，在今湖北蒲圻，而非更往长江下游、苏轼误咏的黄冈。除此之外，他篇所记都在湖南。桃花源就在桃源县西。南岳就在衡山县境。龙标乃王昌龄贬谪之地，在今怀化的黔城。至於《麓山春日》、《半日青山》、《书院夜游》三篇，虽然各有侧重，所记均以长沙对岸的岳麓山为主，其中的古迹不可胜数，单举禹王碑一处，字体荒古，已经可以上追炎陵。书院乃是岳麓书院，从陶侃到朱熹，从王夫之到谭嗣同，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隐士、志士在其间读书、讲学。《崩霆琴》所记是浏阳的谭嗣同祠及其故宅《芷江行》的芷江在怀化市西，紧邻黔境，为抗战之末“受降纪念坊”的遗址。这许许多多的遗址古迹，为中华民族的神话、历史、文化之所附所依，也只有湖南的读书人、像李元洛这么有心的，才便於一一寻访记叙。

李元洛在文化之旅的游记里，对於古迹的历史沿革、人文传统、甚或民间传说等等，交代都颇为清楚，至於亭阁寺庙的题诗或对联，也常常择佳抄录以助游兴。在《麓山春日》里有这么一段：“观音

阁前，虬虬蟠蟠两株六朝松，树龄都在一千七百年以上。这两位树中的长老，铁干虬枝颇有王者气象，暮年杜甫来这里写下《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诗的情景，在它们的记忆中还犹如昨日吧？阁的两侧笔力道劲奔放的联语，就取自杜甫的这首七古的‘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清代的杨伦在《杜臆》中盛赞这一联为‘奇句’。寺门高张，洞庭之阔野仿佛为之而开，殿基深广，竟然插入洞庭之西位于华容县南涸时见沙的赤沙湖，这是何等高广的庙宇，何等雄豪的气象！”

不过这些游记也不全然洋溢着高雅的诗兴；有感於当前大陆社会的庸俗风气，作者也往往怀古伤今，而不免游兴顿灭，忧时情切，变成了文化苦旅。他在《书院夜游》里说：“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之一，便是俗文化的风水与雅文化的书院之奇妙结合，所谓，‘山水自然之奇秀，与文章自然之奇秀，一而已矣。’所以大多数书院都在山林而远离城市，并多为背山面水型，背负丘山而胸怀江河或湖泊。”

但是到了文末，作者笔锋一转：“不由想起明代建於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曾为书院作过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者的游伴开林却答道：“谭嗣同和唐才常这一双中国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英杰，我们只能遥遥瞻望他们的背影了。现在不是有人改顾宪成的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不吭一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吗？”

另一游伴赵晨却正色而言：“社会上流行的俗谚

口碑，说什么‘从政之路红彤彤，经商之路金灿灿，从教之路黑沉沉。’现在不少教师不安於教，不少学生不安於学，全国一年用於吃喝旅游的公款，远远超过一年全国教育的经费。你们还讲什么诗啊？”

第一辑《海上仙山》写的是台湾的山水人文，其中只有《澄清湖一瞥》近於山水游记，至於记述故宫博物院的《云山长忆外双溪》则是又一次文化之旅。《远有楼台只见灯》记三民书局的文化大楼，诉不尽作者对书城文库、亦即所谓琅嬛福地的无限神往，仍然不脱文化巡礼的孺慕乡愁，并且和第三辑的《旺角书香》隔辑呼应。

第三辑《此情可待》的《人在天涯》、《岛国诗夜》虽记新加坡之行，兴趣却在人物，不在山海。《香江夜眺》、《旺角书香》两篇，顾名思义，也得知均写香港。其中《香江夜眺》对於夜色著力不多，未能透彻唤出真境，而致通篇的抒情、写景大半要靠诗句来代理。这在需要用实力来写景、并且由景生情的一篇抒情小品里，似乎喧宾夺主了。我虽然自诩什么右手为诗、左手为文，但愈来愈觉得，一篇散文，即使以抒情为务，也不宜引进太多诗句，而至於“文类乱伦”。所以我一直也很想劝劝叶维廉，不要在散文里多插诗句，甚至整段的诗。

且容我顺着“文类乱伦”的戏语，再作一喻。散文多引诗句，犹如婚礼上新娘进场，身边却带了一队更年轻的美女做伴娘，未免不智。

同时，在游记之中，无论面对的是日月山川、荒城古渡、或是车水马龙，作者在写景或叙事的紧要

关头，都必须拿出真性情、硬功夫来力搏其境，逼使就范，而不应过於引经据典，借古人的喉舌来接战。散文里多引述名家名句，恐怕仍是学者本色。李元洛既然要入籍散文家，就宜乎抛去诗评家的武器。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凤凰游》里的许多游记，无论在抒情或议论上，均有发挥，份量颇重，也许太重了一点，有时就显得旅游的本身反而“事简景稀”，当不起后面的深情高论。这呼应与比重的问題，有关游记的美学，未可轻视。所以我一直认为，在这方面《游褒禅山记》要比《石钟山记》逊了一筹。再以苏轼自己的赤壁二赋为例，《前赤壁赋》的议论份量颇重，却以抒情的笔调来发挥，同时前面的叙事与写景也自不弱，火候已足，乃能将事、理、情景融於一炉，成为杰作。《后赤壁赋》则大不相同，从头到尾只有叙事、写景，而且事多於景，或者可说事中见景，却毫无议论，至於抒情，已经在叙事、写景之间完成，不须另案办理了。可见抒情之成败，往往取决於叙事是否生动，写景是否逼真：事活而景真，则情已在字里行间，反之，脱离了其事其景而要凌空抒情，则情将焉附，结果恐将徒劳。

第三辑《此情可待》的前五篇，在题材上自成一类。《故乡三叠》写洛阳、青海、长沙：作者诞生、下放、久居的三个地方。《师恩》写作者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往事》专记他大学毕业后下放青海的饥寒岁月。《我的思念在彼岸》回顾和妻子从初识到偕老的半生。《虹豆》则喜述他宠爱的外孙。

反过来说，在这几篇散文里，作者是以为人弟子、丈夫、外祖父的身份来叙事的，加起来隐隐然是一篇小型的自传，令人读来倍感亲切。其中尤以记叙师恩、妻情和青海往事的三篇最为动人。如果能再写几篇来追述一生难忘的友谊友情，自传的兴味就更完整了。在这几篇描写人情的文章里，作者引经据典、尤其是引述诗句的频率，比起在游记里要低得多，因为作者忙于叙事，而且在这方面可引之句本就较少。也正因为如此，同辑写新加坡李豪女士的那一篇《人在天涯》，不但少见引据，而且俭用抒情与议论，文气乃较贯串，文体也就清纯。这种对比，值得作者注意。

说到文体，我发现李元洛的散文有一个现象相当有趣，便是在实际叙事的时候，句法不但单纯，而且单行，但是遇到需要抒情，句法就往往变得复杂，而且骈行起来。例如《秋读炎陵》的文末，就有这么一句：“陵北山顶原有积水一泓，冬夏不涸，名曰‘天池’，相传炎帝於此洗药，所以又名‘洗药池’，而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山林被毁，水源断绝，千百年来碧水粼粼的洗药池，成了干涸的黄土坑，像一只盲瞳凝视苍天。”一句话长逾百字，单行的句法语意清晰，节奏分明，句中段落长短交错，井井有条，句末的比喻不但妥贴可玩，而且反示以前的池水有多明丽，的是佳句。

但是一旦刻意抒情，例如在《故乡三叠》一文里，他就会说：“洛阳是生我的故乡，我不能忘记它，如同长成的绿树怀想它植根的泥土，如同远游的飞

鸟怀想它童年的旧巢。青海西宁则是我作客的故乡了，好像入海的河流忆念曾经访问过的流域，好像流浪的云彩忆念曾经飘游过的天空。”

这样的对仗不但过份整齐，也嫌过份重复，两个‘如同’对两个‘好像’，然后是两个‘怀想’对两个‘忆念’，都失之单调，至於四个‘它’字，更觉多馀。这样的对仗句法在《凤凰游》里几乎每页都有，就太多了，有时却又变成三联成串的排比。例如“把千年入寐的历史围在其中关在其中锁在其中”，或是“原来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绿野绿野绿野，而今却是满目的红尘红尘红尘”，就重复太甚，缺少变化。

当然作者笔下的抒情美文并不全然如此，高明的时候也有像《流花湖，留花湖》里这样灵巧的句子：“它（流花湖）碧得深酡，三三两两的游船遡游湖上，双桨刚一划开水波，深绿色的封面就匆匆合起，半尺之下就难以探测地满腹，不，满湖的心事。”

为朋友的新书写序，有点像主持什么开幕典礼，理应“隐恶扬善”。如今我竟得失并举，把序言写成了书评，简直是“文化乱伦”。不过我为人写序，恶习一向如此，只因我深信，不但对于作者，更且对于读者，一篇诚恳的书评远胜于了一篇敷衍的序。李元洛原是评论名家，我在此所发浅论，相信他早就了然，何须我多言哓哓。只是他既然敢闯来创作的重地探奇，我又何惧乎僭入批评的禁区去指指点点？

相信他下一本散文集必能扫清我今日的多虑。

书中游记多篇，其名胜古迹之地理方位，在一

般地图上不易逐一指认，特制简图一幅，以便台湾的读者。我是一个地图迷，不但耽於对图遐想，更爱动手绘制。不过在我为人写序的记录里，序之不足，更继以图，如此节外生枝，却是史无前例。

一九九五年七月於台湾西子湾

我的散文观

李元洛

我以前在从事诗论研究与诗歌评论之时，曾给自己订下一条戒律：不得写诗，以免理论与实践脱节而貽眼高手低之讥。现在以散文创作自娱，照理也不宜高谈散文理论，但“潇湘散文精品丛书”的体例，是以“我的散文观”一文弁于卷首，适逢我曾应《散文》主编、散文家贾宝泉先生之约写过一篇短文，故尔随手拈来而略作补充。

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审美趣味也因时因人而异，春兰秋菊不同时，不必也何必强求一律？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欣赏的是有思想、有情怀、有才气、有学问、有个性、有文采的散文，而那些蹩脚的伪劣散文之作，则往往是四大皆空而六有俱阙。

综观古今中外的散文，那种上选之作或无上妙品，非哲人、学者、才子集于一身者莫办。

它们有哲人的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和关怀，深远如哲学的天地，启人思索与顿悟，让人得到灵魂